《垂死的肉身》中的记忆书写、空间表征与身份建构

Memory Writing, Spatial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Dying Animal*

刘兮颖（**Liu Xiying**）

内容摘要：美国杰出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在其代表作《垂死的肉身》中以记忆书写的方式展现了大学教授大卫·凯普什关于学生情人康秀拉·卡斯底洛的视觉记忆、身体记忆以及儿子肯尼的个体记忆。不同的记忆建构了大卫的教师、情人、父亲等多重伦理身份，而他们之间伦理关系的变迁以及伦理秩序的更改都是在不同空间中铸就和完成的。同一空间对于个体而言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展示了个体记忆的不一致性，同时构建了不一样的身份。公寓对大卫与康秀拉而言是私人空间，他们的伦理关系也随之由显性的师生关系转变为隐蔽的情人关系。与此同时，公寓对大卫与肯尼而言是家宅空间，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和个体记忆在此得以延续和发展。

关键词：《垂死的肉身》；记忆书写；空间表征；身份建构；文学伦理学批评

作者简介：刘兮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 世纪美国犹太文学中的记忆书写研究”【项目编号：16BWW063】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Memory Writing, Spatial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Dying Animal*

Abstract: Philip Roth, an outstanding American Jewish writer, presents David Kepesh's visual memory as well as physical memory about his student lover Consuela Castillo and individual memory about his son Kenny in his masterpiece *The Dying Animal*. Different memories construct David's multiple ethical identities as a teacher, a lover and a father. The changes of ethical relationship and ethical order among them are created and completed in different spaces. With the formation of memory in different spaces, the ethical identities of David and Consuela have changed accordingly, and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has changed from the explicit teacher and student relationship to a hidden lover relationship. Meanwhile, the father and s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avid and Kenny and the individual memory

continue and develop in the family space.

Keywords: *The Dying Animal*; memory writing; spatial representati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uthor: Liu Xiying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Email: longlongw@126.com).

美国杰出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1933-2018）一生著述颇丰，曾荣膺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布克奖等诸多奖项。他的代表作《垂死的肉身》（*The Dying Animal,* 2001）以记忆书写的方式展现了大学教授大卫·凯普什关于学生情人康秀拉·卡斯底洛的视觉记忆、身体记忆以及儿子肯尼的个体记忆，不同的记忆确认了大卫的教师、情人、父亲、好友等多重伦理身份，“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 263）。“正是伦理选择赋予人理性与伦理意识，使之最终转变为真正的具有伦理意识的人”（Nie 386）[1]。身份是伦理选择的结果，“在具体的选择中，由于选择的伦理性质的不同，其选择过程和选择结果亦不同”（聂珍钊 267），而记忆把身份保存下来，使之成为身份存在。他们之间伦理关系的变迁以及伦理秩序的更改都是在不同的空间中铸就和完成的。

《垂死的肉身》中大卫对于康秀拉的记忆贯穿始终，经由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的转换，建构起各自不同的伦理身份。在大卫由视觉到触觉的记忆感知中康秀拉的身体经历了由遮蔽到敞开的过程，前者对应着公共空间——教室、办公室以及剧院，而后者对应着私人空间——公寓。与此同时，记忆在不同的空间中形成，他们的伦理身份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伦理关系也随之由显性的师生关系转变为隐蔽的情人关系。另一方面，大卫与肯尼之间的父子关系和个体记忆在家宅空间中得以延续。公寓这一处所对于不同类型的伦理关系来说有着各自非同一般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它对于大卫和康秀拉而言是私人空间，他们所有的亲密关系都在此完成，那么对父亲大卫和儿子肯尼来说，这是他们渴望而不可求的家宅空间，紧张而富有张力的父子关系在此延伸并得到相当程度的缓和。应该指出的是，大卫与他人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及情感记忆在不同的空间中铸就，记忆附着于空间之中，赋予其不一样的意义，与此同时，空间也铸造了伦理关系并镌刻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乃至历史记忆，“空间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这就是空间的意义”（巴什拉 8）。时间之流与空间之维相融合，“回忆形象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使其被物质化，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使其被现时化，所以回忆形象在空间和时间上总是具体

1 凡未特殊注明，均出自笔者拙译。

的”（阿斯曼 31），人的记忆正显现于其间。小说反映了大卫在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以及家宅空间中经由不同的记忆建构伦理身份与伦理关系的过程，以及对于性爱、衰老、父子关系和死亡等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和感悟。

一、公共空间中的视觉记忆：显性的师生关系

大卫的视觉记忆在公共空间中形成，与康秀拉的身体有关。小说中依次展示的公共空间包括教室、办公室以及剧院。大卫与康秀拉在教室——作用于教学的公共空间中初识和交流，并形成了显性的师生关系。公共空间中康秀拉的身体是被遮蔽的，大卫的个体记忆也是秘而不宣的。在所有的感官中，视觉的地位尤为突出和重要。视觉记忆与公共空间相辅相成、互为制衡。公共空间具有敞开性、非私密性和监督性，身处其中的人们既是观看者，也是被观看者。人们对于公共空间中个体隐私必须得到保护早已达成共识，公共空间对个人身体的展示和裸露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规训与限制，这正是制约记忆不可或缺的因素，使得大卫最初的个体记忆只能受限于视觉领域。需要指出的是，视觉记忆作为记忆的一种，事实上也属于选择性记忆，这是大卫进行伦理选择的结果。

大卫的视觉记忆淡化了他的教师身份，凸显出他潜在的性意识和兽性因子。他的回忆预示了日后伦理身份转换的必然性，从第一次见到康秀拉开始大卫就根本没有将她视为自己的学生，而是潜在的未来情人。在大卫的回忆中康秀拉的身体被衣物遮挡着，仍然显示出无法抗拒的性魅力。他观察到“她是个丰满的女人。丝质衬衣敞开到第三颗纽扣处，因此你看得出她有一对魅力十足的漂亮乳房。你一眼就能看到乳沟。而你也明白她对此心领神会。你明白，尽管她端庄谨慎、考究时尚——或者正因为如此——她对自身有所认识”（5）[1]。叙述者从大卫的视角聚焦康秀拉的身体并进行了详尽的描绘，从上述引文可以发现，最初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语言上的交流。大卫以男人的眼光在审视作为女人的康秀拉的外表，而不是以师长的眼神在关爱学生。作为观看者，他把康秀拉当作了被凝视的客体和对象，由外向内的视觉描写隐藏着男性的主体意识和掌控欲，康秀拉在大卫的凝视中已成为男性主体视觉愉悦的色欲对象。

在教室这一公共空间中大卫与康秀拉是合法且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师生，他们展现出公开且恰如其分的伦理关系——老师与学生，即教导者与受教者。大卫传授知识的义务和权力得以在公共空间中实现和强化，相对地，公共空间在给予了大卫权力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他的特权。大卫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在他们完成期末考试拿到成绩之前，我不和他们有任何私人接触，而且我也不再是什么正式的监管人〔……〕我并不过早地和她们接

1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菲利普·罗斯：《垂死的肉身》，吴其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以下仅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触，免得给学校里的人落下口实”（7）。由此可见，大卫深谙公共空间中他必须遵循的伦理准则，这与他的知识分子身份密切相关。众所周知，知识分子因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正如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1987）中指出的那样：“权力需要知识，知识赋予权力以合法性和有效性（两者中有着必然联系）。拥有知识就是拥有权力”（Bauman 48），渊博的学识又进一步巩固了这种特性。鲍曼认为现代知识分子是立法者，“立法者的角色由对权威性话语的建构活动构成〔……〕他们的知识，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完善有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关系”（Bauman 4）。权威的存在意味着师生关系具有天然的不平等性，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凌驾于学生之上的。而基于这种不平等性的交往会导致两性关系的失衡，尤其是教师会利用特权区别对待学生情人，从而导致受教育者得不到公正对待。正因为此，师生之间的恋情在美国高校内是被明文禁止的。显而易见的是，作为教授的大卫与学生康秀拉之间存在着伦理禁忌，而这正是由他们的伦理身份决定的。

公共空间的存在制约了大卫的伦理逾矩，限制了性在空间中的自由表达，他只能借助视觉记忆，发挥想象。继教室之后，小说描述了大卫与康秀拉在另一重公共空间——办公室里两次见面的情形。在大卫的回忆中，“按照规定，门对着公共走廊敞开，两人的四肢，对比鲜明的两个躯体必须让路过的每个‘老大哥’看得到”（11-12），敞开的门意味着公开性和边界感，分隔着内与外，向外的公共空间昭示着师生关系的一清二白，肢体语言更能说明问题。而关上的门则意味着封闭与隔绝，营造出私人空间。在大卫的视觉记忆中，记录了康秀拉两次的穿着打扮，特别是有限裸露的肌肤。这是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进行叙述，康秀拉成为被观看的客体，作为学生的她仅仅存在于大卫的视觉记忆而非身体记忆中，公共空间限制了大卫的伦理行为，规范了他作为教师的伦理身份，使之止于视觉领域。

在大卫的回忆中，从公共空间过渡到私人空间，他与康秀拉经历了一段身份认同的错位。康秀拉的自我身份认同与他者眼中的身份认同存在不一致性，她认为自己是大卫的情人，以为大卫渴望了解本真的自我，两人之间会有深度的精神交流，然而在他者大卫的眼中，康秀拉只是性伙伴，后来大卫坦诚自己对康秀拉的社会阶层以及个性特征根本不感兴趣。他毫不讳言地表示：“我只想和这个女孩上床”（19）。康秀拉的存在对大卫而言仅仅在于肉身的审美意义和实用价值，能够唤起他的本能欲望。大卫记忆中他们最后一次出现的公共空间是剧院，小说从大卫的视角出发，详述了康秀拉美妙的身体，“雪白的皮肤，你一看到就想舔一下”（20），相较于演出，显然这是唯一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视觉记忆。康秀拉美貌的外表对于大卫而言极具诱惑力，视觉上有着令人无法自拔的强烈的冲击力，它诱发了大卫渴望亲近的占有欲，而并非爱情。

身处公共空间中的大卫，不仅意识到自己受限于教师身份，更囿于公众人物——文化名人的身份。他的形象具有公开性。文化名人意味着大卫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已经进入公共话语领域，享有普通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名望与声誉，经由学院之外普罗大众的认可与称赞，大卫已重构了自己的身份。作为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他获得了盛况空前的名誉，然而这一身份也意味着他被全方位地审视与观照，受到公众凝视，他不得不通过自我管理进行自我规训，身处公共空间中的大卫是无法抵御来自外界的道德凝视的。因此，为了避免受到他者的凝视和规训，他提出与康秀拉到私人空间——他的公寓中去进一步交流。

显而易见的是，知识分子大卫并不满足于视觉记忆，他与康秀拉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停留在公开的师生关系上，“私人空间被认为是安全领域。公共空间则是危险的：公共空间被认为不适合女性”（Andserson, et al. 477），唯有从公共空间过渡到私人空间他们之间才有可能发生更为紧密的关联，从而形成不可磨灭的身体记忆，固化他们之间的情人关系。

二、私人空间中的身体记忆：隐秘的情人关系

大卫对于康秀拉身体记忆的不断回顾强化了他的情人身份，弱化了他的教师身份。他在往事中构建了自我身份，也必然囿于私人空间。沉重肉身的生命力转瞬即逝，私人空间也是受限的，裸露的身体必然在私人空间中才能得以充分展示。恰如列斐伏尔指出，“在重现占有空间的同时，重现占有身体，因为身体是空间中无法消除的组成部分”（Lefebver 166-167）。大卫关于情人康秀拉的身体记忆仅仅存在于私人空间公寓之中，永远无法延展到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中去。

在大卫的回忆中师生之间的伦理禁忌很快被破坏，随着大卫与康秀拉之间的交往由公共空间转移到了私人空间公寓，他们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由显性的师生关系发展成为隐秘的情人关系。公寓作为私人空间见证了大卫记忆中康秀拉的身体由遮蔽到敞开的过程，他们的伦理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从师生到情人。他们之间的情人关系产生于公寓也终结于此。师生关系中康秀拉的身体一直被衣物所掩盖，大卫却透过服饰展开了男人的性幻想，之后当他们转变成情人关系时，康秀拉的身体无所遁形。大卫对于康秀拉的身体记忆不再欲盖弥彰，而是无所顾忌的展示与敞开。他的身体记忆形成于私人空间之中，他们在此肌肤相亲、相互占有。“身体敏感性决定记忆如何在个人情景中形成并起作用”（施密茨 158）。“身体记忆比头脑的记忆更可靠。头脑的记忆在老年时将变得不再牢固，当这一现象如期而至时，身体的记忆却不会失去它的力量”（阿斯曼 280）。所有关于康秀拉的身体记忆都在此产生并镌刻在他的脑海深处。

身体记忆具有私密性和个体性，私人空间意味着密闭性和非公开性，二

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契合、互为表征。康秀拉美好的肉身激发了大卫无穷无尽的欲望和想象。“乔治·巴塔耶认为，性爱是对禁忌和限制的基本的侵越。〔……〕在不期而遇的性爱之中，不连续和界限被突破了，即使只是暂时的。一个身体进入了另一个身体，突破了它的墙壁，进入了它的身体入口”（Brooks 274）。情欲为现世短暂生活提供了暂时性的超越。“色情是‘对于自始至终通向死亡的生命之肯定’”（qtd. in Brooks 275）。康秀拉年轻美妙的躯体对于日趋衰老的大卫而言既是难以言喻的诱惑，也是勃勃生命力的象征。大卫为之吸引沉溺其中，与其说他膜拜的是康秀拉美妙绝伦的肉体，不如说他渴求的是永不衰竭的生命力。“乔治·巴塔耶断言，每一个体都觉得他或她自己是不连续的，而性欲——试图突破另一个人为自己的身体所设置的孤独的禁闭，从而对之有所了解——表明一种努力，与别人一起领会某种连续的感觉，哪怕只是暂时的”（Brooks 8）。个体可以通过向所爱之人投射与众不同的价值与意义，寻求生命的绵延与死亡的延迟。身为公众人物且拥有强大话语权的大卫日趋衰老，而他显然不甘于此。年老的躯体必将从公众关注的眼光中消失，身体资本不再具有魅力和价值，这是大卫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身体的衰微与大卫依然蓬勃的精神相抵触，他渴求康秀拉年轻的肉身并投入性爱关系中正是为了逃避死亡的威胁。对康秀拉的身体记忆成为大卫对抗衰老与死亡的重要利器。“他将性看作是对死亡的报复，将欲望看作道德的对立面”（“The dying animal” 45）。

不仅如此，身体记忆还强化了大卫与康秀拉彼此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身份，而这正是在私人空间中形成的。“私人空间里，通常看来最成问题的、最令人感兴趣也最令人痛苦的，就是身体”（Brooks 26）。大卫作为康秀拉的情人，只能在私人空间公寓中交往，身体成为双方最重要且最有效的沟通工具。身体本身是具有私密性的，然而人的情感是流动善变的。小说中，大卫与康秀拉之间伦理关系的建构经由教室转换到公寓，空间的流变带来了伦理身份的变化，由此伦理关系亦发生改变，他们由师生转变成了情人。情人关系藉由身体记忆得以绵延。

在大卫的自传体记忆中，他与康秀拉情人关系的决裂始于对方试图将他们的关系延续到公共空间——泽西城的毕业晚会中之时。对于康秀拉而言，毕业晚会是一场庄严而重大的仪式，意味着她从此脱离学生身份，成为社会人。这是她人生中的重大时刻，见证了她的成长，预示着未来的成熟，具有非同一般的纪念意义。然而，对于大卫来说，他意识到自己只能作为康秀拉的老师出现在毕业晚会上，因为康秀拉的父母、亲朋好友绝对不可能接受已接近暮年的大卫作为男友身份现身，他们之间的年龄如此悬殊、身份地位差异过大，这种有悖传统习俗的不伦关系是根本不会得到主流社会的接纳与祝福的。不仅康秀拉的声名被毁坏，大卫也将遭到质疑，舆论会怀疑他是否利用师生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以不正当手段对康秀拉实施诱惑和胁迫。而彼时尚且年轻

的康秀拉没有考虑到大卫的担忧，她沉浸在即将到来庆典的愉悦氛围中，完全没有顾及大卫的真实想法。事实上，大卫与康秀拉彼此之间有着心照不宣和不言自明的认知：他们隐秘的情人关系永远无法延展到公寓以外的空间中去。在公共空间中，他们之间的身份将囿于教师和学生，无法逾矩。实质上，热切的情人关系与表面上疏离的师生关系形成了强烈反差和对照，如此荒谬的场景是大卫无法忍受和不愿意面对的。康秀拉伦理诉求的不被满足，导致了两人情人关系彻底地分崩离析，成为了陌路人。

大卫与康秀拉之间的情人关系被认为是逾越伦常与不合理的，在这段不正常的伦理关系中，大卫多重且复杂的伦理身份使其深陷矛盾的伦理困境中。作为大学教授，大卫拥有毋庸置疑的话语权，对于彼时尚是学生的康秀拉而言，他的身份是老师；作为文化名人，大卫是通过电视传媒播撒思想的公众人物、人生导师，他的形象正面公开且积极向上；作为离异男子，大卫是性解放者；作为花甲之年的情人，大卫面临着衰老与死亡的威胁。而“性是证明我们的活力，表明我们仍然年轻、强健、有魅力，表明我们尚未死亡的最简便的途径。它以最高的形式证明我们有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能力。性欲与生育是保证我们的姓氏和基因在我们子女身上代代相传的唯一途径”（梅 109）。年过半百，大卫的欲望仍未衰竭，这恰好是旺盛生命力的显现与非凡创造力的保障。而“死亡本能把‘心理’与‘自然’、性欲与自我保存结合在一起”（奥斯本 159），大卫不得不面对向死而生的境况，他的自我身份认同感、与康秀拉之间伦理关系的嬗变都面临巨大考验。他们之间存在着颇为悬殊的等级落差，年龄、身份、财富、社会地位给双方带来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焦灼感。高级知识分子有着对于知识的绝对掌控权力，而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后来延续到他们的情爱生活中。

大卫与康秀拉之间最大的鸿沟不仅仅在于社会地位和身份落差，更是无穷无尽的岁月以及无法跨越的时间。对于大卫而言，“觉察自己老了和正在变老意味着，在身体和在人们可以称为灵魂的东西中拥有时间”（埃默里 29）。然而，作为老年人的他不得不面对的是日渐消逝的时间和逐步缩微的空间，年轻的情人康秀拉展望的却是敞开的时空。38 年的差距令他们外表上形同父女，实质却是情人关系。性爱对大卫而言不仅是控制康秀拉的手段，同时也是他战胜衰老和死亡威胁的力量。衰老在现代美国社会中已具有负面的文化价值，成为需要治愈的疾病。强大的性能力正是对抗衰老的明证。小说中还写道：“性不只是肉体的摩擦、浅薄的玩笑。性还是对死亡的报复。别忘了死亡。千万别忘了它。是的，性也受制于死亡的力量”（76）。显而易见的是，大卫与康秀拉的情人关系仅仅且只能存在于私人空间中，康秀拉渴求的身份僭越未能实现，她的伦理逾矩终结了彼此之间的关联。而大卫始终保留着对于康秀拉的身体记忆，在记忆中他继续占有着康秀拉，并试图将这段身体记忆变为永恒，昭示着他曾经拥有的性权利，同时也为其日后的伦

理关怀提供了情感记忆。不得不指出的是，随着情人关系的终结，这段情感记忆也不再美好如初。“它不会试图开放自我，接受未来，从而让人们从根本上尝试着改善，而是固执地停留在过去不能自拔”（汉娜 160）。大卫相当长一段时间陷入困境中无法自持，他对于嘎然而止的情人关系带来的巨大虚空和无名之痛无能为力。尽管眷念着与康秀拉经历过的一切，然而他对于修复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却束手无策。因为双方都不可能跨越身份、地位与年龄的巨大沟壑。如果说这段情感记忆带给大卫一定程度上的精神创伤的话，那么患病之后康秀拉的复归治愈了他的创伤，他意识到两人的关系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变迁发生了彻底且不可抗拒的改变。

小说详细描述了大卫对于康秀拉的身体经历了从最初的觊觎到后来的占有妒忌再到告别这一历程，他迷恋康秀拉美妙的肉身无法自拔，直至最后得知康秀拉因罹患乳腺癌即将切除乳房时，身体记忆唤醒了大卫对于康秀拉的全部情感——怜悯、疼惜、倾慕、爱恋。身体成为联结他们感情的重要纽带。康秀拉得知自己罹患乳腺癌之后感到惊恐万分，“实际上疾病能够影响所有的生活选择，重新塑造个体的身份。病痛或失能会使人脱离之前的社会角色和社会活动，包括工作社会关系和家庭责任。患有严重疾病或失能的人将成为永久性的病人这是一种重要的状态改变”（Lupton 95）。乳腺癌不仅对康秀拉身体的完整性产生威胁，而且彻底改变了康秀拉的身份——她由健康的成年女性变为癌症患者，这种身份的改变是不可逆转的。癌症在现代社会中等同于死亡，“疾病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桑塔格 7）。患癌令康秀拉产生羞愧感和脆弱感，更削弱了她的自我控制“癌症是一种不体面的疾病，象征着邪恶（Lupton 62）。她仿佛已经在道德上低人一等。有关家族的死亡记忆更是加深了康秀拉的恐惧感、危机感和孤立感，令她深陷紊乱的情绪。

濒临绝境之时，康秀拉选择回归私人空间。当大卫与康秀拉在公寓中重逢时，他意识到康秀拉不再是作为情人或者学生出现，而是一个亟待帮助的朋友和病人。康秀拉表现出对大卫强烈的情感依赖，她需要进行一种告别仪式——大卫与她身体的一部分乳房的告别。大卫不仅触摸了带给他美好回忆的身体，还拍照进行了留念。有研究者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他人、体会他人感受，一定程度上跟我们的身体和他人之间的距离有关〔……〕当我们和某人或某物在身体上更亲近时，大脑中更加原始的情感区域就被激活了，可以推测这种变化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他人的感受”（贝洛克 279）。身体记忆激发了大卫全部的怜悯与同情，他意识到自己将面临与康秀拉生死相隔记忆尽失的决裂。表面上他触摸的是康秀拉即将垂死的肉身，实际上拥抱的是死亡本身。

综上，大卫的视觉记忆与身体记忆分别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中形成，

而“记忆已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问题，因为它与身份形成密切相关”（Ndi and Fishkin 138）。视觉记忆限制了大卫与康秀拉之间的师生关系，而身体记忆却强化了他们的情人关系。

三、家宅空间中的个体记忆：重构的父子关系

如果说情人关系带给大卫的是刻骨铭心的身体记忆的话，那么大卫与肯尼的父子关系则给予了彼此完全不同的个体记忆。个体记忆通常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存在，并不构成完整的回忆，它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并发挥作用，能够跨越世代进行代际之间的传递，并深刻影响到个体的选择及其命运走向。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情人关系还是父子关系都是在公寓这一处所中建构和完成的。从小说中关于记忆的书写可以看出，大卫与肯尼对于彼此之间的父子关系和情感联系有着截然不同的个体记忆。这意味着个体记忆本身是个人化与私密性的，同时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他们共同的记忆在大卫的公寓——属于父子俩的家宅空间中铸就和完成，也正是在这里，大卫开始重新审视作为父亲的自己和作为儿子的肯尼，而他们对于各自的身份和困境有了全新的认知和了解。身为父亲的大卫由最初的缺席到最终重释了父性权威，肯尼则经历了叛父到寻父的心理历程，他们的父子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

大卫与肯尼在彼此的个体记忆中是完全不同的人。在肯尼的记忆中，父亲大卫自私自利放浪形骸，毫无责任心。在大卫的记忆中，儿子肯尼已经成长为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男人，有着高度的家庭责任感，坚定自信严谨自律克己守礼。他不顾自己的反对，娶了未婚先孕的女孩为妻，承担起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事实上，他们一起生活的时间非常短暂，属于彼此共同的家庭记忆也是微乎其微的。儿子肯尼从小在离异单亲家庭中长大，父亲于他而言是缺席的存在。记忆的缺失使得少年肯尼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对父亲的情感淡漠疏离甚至反感，他并不认同大卫作为父亲的身份。然而冷淡的情感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发生了微妙而复杂的变化。青年肯尼反叛甚至厌恶父亲，否认他的一切作为和劝导，更拒绝父性权威的指引。当步入中年的肯尼遭遇到精神危机时，他开始向父亲大卫求助。有心理学家指出，人们“和伴侣的关系是建立在和父母的早期经历基础之上的。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独特的问题，母爱也是一样，被打上了时代和社会形态的烙印很明显，因为理想的父母和理想的教育并不存在”（弗洛伊德 63）。肯尼与妻子看似完美的婚姻生活遭遇到与父母一样的伦理困境，他力求缔结美好婚姻的愿望在人性深渊的凝视中土崩瓦解。

人到中年的肯尼在精神上开始与父亲和解，他意识到不应苛责父亲。作为父亲，肯尼出于对自己童年生活中父爱缺失的补偿心理，尽职尽责地为子女付出一切；作为丈夫，他却与父亲一样有了婚外情人，成为婚姻中的背叛者；作为儿子，面临中年危机的他渴求得到父亲的指引和关照。小说中，肯尼不

断打电话给大卫，到父亲的单身公寓里与其聊天，试图摆脱困扰。多年后父子在公寓中重聚并缔造了属于他俩的家宅空间，家宅空间事实上隶属于私人空间，“这些私人空间有助于实现一些新的价值观念，它们注重个体，注重与家庭、朋友以及自我之间的单独交流所需要的亲密”（Brooks 28）。大卫与肯尼在此得以重新审视彼此之间僵化已久的关系，并感受到相互之间的关怀和爱意。

在父子二人共同建构的家宅空间中，大卫通过回忆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彼此的伦理身份和伦理困境。小说中提到，肯尼是忒勒马克斯。显然在父亲大卫眼中肯尼如同忒勒马克斯一般是迷惘而困惑的儿子。在开创西方叙事文学源头的荷马史诗中忒勒马克斯出门寻父，渴望找回并重塑父性权威。与此同时，奥德修斯重新获得的不仅仅是伊萨卡岛国的王位，更是父亲这一不可或缺的身份，为此他宁可放弃永生的机会。肯尼与荷马史诗中的忒勒马克斯一样，两人颇多共同之处：其一，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都缺乏父性权威的指引，年幼之时即缺失了父爱，由母亲抚养长大；其二，作为儿子，两人都有着主动寻父之旅，只不过肯尼的寻找更多体现在精神上，而忒勒马克斯的寻找体现在遥远的路途中，并克服了重重障碍；其三，肯尼和忒勒马克斯最终都找回了父亲。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肯尼与父亲大卫在公寓中建构了家宅空间，重塑了父子关系；而忒勒马克斯在父亲奥德修斯的回归中一起构建了权力空间，宫殿之于他们父子的意义与其说是家宅不如说是权力倾轧的中心。

然而，与此相对照，大卫绝非荷马史诗中历经磨难最终返回故乡的奥德修斯，更不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塑造的“反英雄”布鲁姆，而是“卡拉马佐夫式的父亲”（85）。《垂死的肉身》中数次提到这一比喻。作家罗斯在这里运用了一个文学典故，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是荒淫邪恶的老父亲，代表着腐化堕落的父性权威。卡拉马佐夫与大卫本人之间的确有共同点：第一，他们都是好色的老父亲；第二，他们都有儿子，血缘父子关系中儿子厌弃憎恨自己的父亲；第三，行将就木之年，父亲们还有着旺盛而邪恶的情欲，拥有年轻漂亮的情人。他们的区别在于肯尼并没有明显的弑父意图，至少在作品中未提及，也没有与父亲争夺情人，破坏伦理禁忌。大卫以“卡拉马佐夫式的父亲”自喻，颇富黑色幽默的色彩和夸张反讽的意味，由此可见作为知识分子，他对于自我身份有着不同寻常的清醒观照和自省意识。

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大卫与肯尼之间的关系是西方文学中“父与子”母题的再现，而寻父有着更加复杂深刻的文化精神意蕴和价值取向。远古时代的奥德修斯作为英雄父亲，在权力空间的争夺战中赢得了全面胜利，对于儿子忒勒马克斯有着毋庸置疑的引导和启迪的作用，而 21 世纪的美国父亲大卫却只能蜷缩于公寓之中，以自嘲的方式倾听儿子肯尼的烦恼，无法给予任

何实质性帮助。从权力空间过渡到家宅空间，从无所不能的英雄父亲到无能为力日趋衰老的父亲，反映出父性权威的衰微与没落，时代的遽变带来伦理身份、个体记忆和空间的变化，由此也影响到父亲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巩固，血缘父子遭受到严峻的考验与淬炼，更平添荒诞感。肯尼在从儿子到父亲伦理身份的转换过程中，经历了厌弃父亲－寻找父亲－模仿父亲的历程，他复制了父亲不羁浪荡的人生，变成自己最鄙视的模样，仿佛成为大卫的替身——背信弃义的出轨丈夫，然而肯尼也在相当程度上达成了与父亲的和解，父子关系发生令人惊异的改变，似乎成为荒诞人生的注解。

在父子俩共同营造的家宅空间中，大卫深刻反省自己作为缺席的父亲曾给予肯尼的伤害，他的自我解剖是入木三分的，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自古希腊以来极富英雄主义色彩的父性权威，展示了父亲这一伦理身份之下人性的卑微脆弱与渺小彷徨。肯尼对父亲鞭辟入里的批判一方面显示出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和思辨性，而另一方面作为儿子他对大卫情感上的眷恋与信任更展示了人性本身的复杂多变。父子之间展现出来的与其说是亲情的复归，不如说彼此的厌弃与审判加强了深刻的羁绊，远胜血脉情深。正如社会学家米尔斯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在家庭这样的神圣小群体里，'共同价值'的一体性也绝不是不可或缺的：不信任和憎恨倒可能恰恰是维系一个彼此关爱的家庭所需要的东西"（Mills 40）。父与子面临的是相同的伦理困境，大卫选择放弃丈夫的身份，仍以悲悯之心关照儿子的精神危机。肯尼则在丈夫、婚外情人与父亲三重身份之间寻求平衡时产生了伦理焦虑，他对于父亲离弃与缺席的审判实际上映射了自身的恐惧与愤怒，对于父亲伦理缺位的指责也是对自己未来有可能面对相同境遇时的情感投射。

菲利普·罗斯在小说《垂死的肉身》中以记忆书写的方式中展示了三重空间：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与家宅空间，个体的记忆在不同的空间中产生，形塑并铸造了人物彼此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与伦理身份。空间、记忆与身份这三者之间相互印证，形成互相构建的关联。当大卫的视觉记忆受限于公共空间时，与康秀拉之间形成了显性的师生关系，而随着公共空间转移至至私人空间公寓，他们的伦理关系由师生变成了隐秘的情人，大卫的身体记忆则固化了这一伦理身份。不同个体对于同一空间的有着截然不同的体悟与感受，如果说公寓对于大卫与康秀拉而言是私人空间的话，那么对于大卫与肯尼来说是家宅空间的重构。大卫与肯尼之间的淡漠疏离的血缘父子关系在个体记忆中已铸成，而公寓给予了他们重新审视彼此身份的空间，共同的记忆在此绵延，最终形成了父与子之间坚不可摧的纽带。

Works Cited

让·埃默里：《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杨小刚译。厦门：鹭江出版社，2018 年。

[Améry, Jean. *About Aging: Revolt and Resignation*. Trans. Yang Xiaogang. Xiamen: Lujiang Press, 2018.]

Andserson, Kay Steve Pile Mona Domosh and Nigel Thrift, ed. *Handbook of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3.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

[Assmann, Aleida. *Memorial Space: The Forms and Changes of Cultural Memory*. Trans. Pan Lu. Beijing: Peking UP, 2016.]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 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Assmann, Jan. *The Cultural Memory: Writing, Recollection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high Culture of the Early Periods*. Trans. Jin Shoufu and Huang Xiaochen. Beijing: Peking UP, 2015.]

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年。

[Bachelard, Gaston. *The Poetics of Space*. Trans. Zhang Yij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3.]

Bauman, Zygmunt.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西恩·贝洛克：《具身认知：身体如何影响思维和行为》，李盼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

[Beilock, Sian. *How the Body Knows Its Mind: The Surprising Power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to Influence How You Think and Feel*. Trans. Li Pan.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2016.]

Brooks, Peter. *Body Work :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3.

伊基·弗洛伊德：《厄勒克特拉 vs 俄狄浦斯》，蔺秀云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年。

[Freud, Iki. *Electra vs Oedipus*. Trans. Lin Xiangyun. Guilin: Lijiang Press, 2014.]

Lefebver,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Lupton, Deborah. *Medicine as Culture Illness, Disease and the Body in Western Socie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3.

罗洛·梅：《爱与意志》，冯川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年。

[May, Rollo. *Love and Will*. Trans. Feng Chuan. Beijing: International Culture Ltd., 1998.]

Mills, C. Wright. *The Sociolgical Imagination*. NY: Oxford UP, 2000.

汉娜·莫妮耶、马丁·盖斯曼：《记见未来：记忆如何影响你的一生》，常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Monyer, Hannah and Martin Gessmann. *The Brilliant Memory: The Brain from the Past Makes Our Future*. Trans. Changyuan.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17.]

Ndi, Bill F. and Fishkin, Benjamin Hart. *Outward Evil Inward Battle: Human Memory in Literature*. Oxford: African Books Collective, 2013.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2021): 383-398.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ture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

[Osborne, Peter. *The Politics of Time: Modernity and Avant-Garde*. Trans. Wang Zhiho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菲利普·罗斯：《垂死的肉身》，吴其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

[Roth, Philip. *The Dying Animal*. Trans. Wu Qiyao.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4.]

赫尔曼·施密茨：《身体与情感》，庞学铨 冯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年。

[Schmitz, Hermann. *Body and Emotion*. Trans. Pang Xuequan and Feng Fang.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2.]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年。

[Sontag, Susan.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Trans. Cheng We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4.]

“The Dying Animal”, *New Statesman*. 24 April 2006: 43-45.